

司馬遷修史志業中潛存的緊張性 ——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及其消融

林聰舜*

摘 要

司馬遷修史的評價標準是否異於聖人，是否不符「尊漢」的要求，亦即《史記》在思想文化與政治的立場上，具有正統性抑或異端性，歷來有熱烈討論。本文由形成司馬遷修史志業中很重要的家學、父命，以及繼承孔子作《春秋》這兩個重要因素，探討司馬遷修史志業中潛存的緊張性，並說明《史記》如何站在更高的作史理想，消融正統與異端兩面性的對立，完成價值立場一貫的一家之言。

對司馬遷修《史記》影響很大的家學、父命，都含有黃老與儒家理念夾雜的多元價值，形成儒家與黃老間的緊張性。本文說明史公如何接受家學、父命並超越之，轉化其保守性格，並使黃老成為批判時政與儒者缺陷的理論根據之一。如此，肯定黃老也可以成為《史記》追求王道理想的一環，儒道衝突與黃老的異端性在更高層次中被消融了。

《史記》表現呼應時代與朝廷要求的正統性，以及對朝廷的銳利批評，所呈現的政治立場上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也都可以在《春秋》中找到根源，亦即與司馬遷繼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志業有關。然而，《史記》表現出銳利的現實批判，呈現政治立場上的異端性，應視為體現孔子作《春秋》精神，是追尋王道理想的手段。如是，司馬遷由繼承孔子作《春秋》而來的修史志業中潛存的緊張性，以及政治立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場上呈現的異端性，也消融在更高的價值之中了。

關鍵詞：《史記》、《春秋》、黃老、異端

Tension in Ssu-ma Ch'ien's Vocation of Writing *Shih-chi*: Conflict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and It's Final Solution

Lin Tsung-Sh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t has been highly debated that if there was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valuations of history modification made by Ssu-ma Ch'ien and Confucius, which meant whether *Shih-chi* was on either an orthodoxy or heterodoxy posi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 the aim of the thesis wa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tension among Ssu-ma Ch'ien's history modification from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Ssu-ma Ch'ien's family learning from Ssu-ma T'an, which vitally formed Ssu-ma Ch'ien's history modification, and succeeded to Confucius's *Chunqiu*. I further explained how *Shih-chi* stood on a more ambitious idea to mel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Ssu-ma Ch'ien's family teaching implied the multiple worth of Huang-lao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which has form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ose. The thesis explained how Ssu-ma Ch'ien accepted his family teaching and transcended it and then turned conservative into kingly way and policy of benevolence. Thu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fucianism and the heterodoxical Taoism could be melted and further proved that Huang-lao Taoism was one of crucial factors for *Shih-chi* to pursue the most valuable idea.

Shih-chi also revealed the orthodoxy consistent with the age and the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ritique toward the dynasty. Both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toward political

stance could be found in *Chunqiu*, which was related to Ssu-ma Ch'ien's history modification succeeding to *Shih-chi*. However, *Shih-chi* revealed the acute criticism of reality and the heterodoxy of political stance, which should be viewed as the main spirit of Confucius' *Chunqiu*. In conclusion, the potential conflict of Ssu-ma Ch'ien's history modification succeeding to Confucius' *Chunqiu* and the heterodoxy presented on political stance could be melted into a more ambitious value.

Keywords: *Shih-chi*, *Chunqiu*, Huang-lao Taoism, Heterodoxy

司馬遷修史志業中潛存的緊張性 ——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及其消融

林聰舜

一、前言

司馬遷（145B.C.-約 86B.C.）修《史記》，是他一生的志業（vocation），他以生命寫歷史，腐刑受辱後，「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¹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因而稱司馬遷：「活著為了著書，著書為了活著」，認為他的著作是他惟一的存在理由。²由於著《史記》的偉大工程是司馬遷生存下去的理由，他的修史志業自然要展現自我的抱負，追尋意義的實現，因而容易有強烈的立場，所謂：「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³可以如是說：《史記》中呈現強烈的價值立場，甚至挑戰朝廷的標準以及世俗眼中的聖人標準，與史公忍辱不悔的修史志業有相當高的關連性。⁴

然而，司馬遷修史志業呈現的強烈立場，特別是對聖人（儒家）價值標準的認

¹ 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收入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62，頁 2733。

² 〔美〕Stephen Owen 著，田曉菲譯：〈活著為了著書，著書為了活著——司馬遷的工程〉，收入氏著：《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79-84。這句話的涵義，Stephen Owen 隨後做了解釋，下面一段話約略可作為代表：「司馬遷是一個激進意義上的『作者』（authorship），在他自己眼中，他的著作是他惟一的存在理由，千秋萬世之後，我們只是因為《史記》才知道他，他也只是因為《史記》才引起我們的興趣。」

³ 見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收入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卷 62，頁 2735。

⁴ 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是以回顧的語氣，訴說他完成修史志業的意義。前揭文收入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卷 62，頁 2735。

同，以及對當代政治的評斷上，具有正統性抑或異端性的討論上，歷來卻有截然不同的評斷。⁵司馬遷這麼重要的修史立場，何以後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呢？本文擬由司馬遷修史志業中潛存的緊張性（*tension*）加以詮釋，並聚焦在與司馬遷修史志業有關的家學、父命，以及繼承孔子（551B.C.-479B.C.）作《春秋》兩個角度，探討其中的重要根由。本文旨在指出：對司馬遷修《史記》影響很大的家學、父命，以及繼承孔子作《春秋》的抱負，就各含有正統性與異端性的因素，此一潛存的緊張性，對於形成《史記》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有很大的影響。由於《史記》確實具有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後人由於視角的差異，自然容易產生截然不同的評斷。司馬遷最後則是透過更高的價值，消融《史記》中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形成具理想性，且有內在理路一貫性的「一家之言」。

二、正統與異端——《史記》在思想文化立場以及政治立場上呈現的兩面性

司馬遷修《史記》，具有發揚經學的王道理想，特別是繼承孔子修《春秋》的抱負，此一以《史記》作為第二部《春秋》，或「以史為經」的經學企圖，在「獨尊儒術」逐步成為帝國政策的武帝時期（141B.C-87B.C.在位），呈現其極強的正統性。我們甚至可以把《史記》放到西漢思想家以經學義理為漢帝國建立理想秩序的脈絡中，視為當時主流學術思想的一環。⁶

此外，《史記》肯定秦漢以來的大一統與尊君的中央集權制，肯定削藩的強幹弱枝政策，稱讚晁錯「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⁷肯定「推恩」政策的功效：「彊

⁵ 傳統學者主要以太史公「是非頗繆于聖人」之類的評斷為核心，進行正反意見的陳述，詳下文。本文有關《史記》正統性與異端性的討論，範圍則略為擴大。

⁶ 參看拙作：〈論史記的以史為經〉，收入林聰舜：《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12-45。

⁷ 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太史公自序》（臺北：鼎文書局，1985），卷130，頁3316。

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⁸這些主張也呼應了當時的朝廷政策。清錢大昕（1728-1804）稱：「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尋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⁹「尊漢」之說雖忽略《史記》批判朝廷的言論，但並非憑空立論，《史記》中確實可以找到很多「尊漢」的立論根據。¹⁰

然而，認為太史公言「是非頗繆于聖人」之類的評斷卻在《史記》流傳¹¹不久後就出現，最後結穴於後人熟知的班固的論點。¹²另外，也出現《史記》非貶當世、削書、謗書等說法，衛宏（活動時代約東漢光武帝在位時代，25-57）《漢舊儀注》曰：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¹³

東漢明帝劉莊（57-75 在位）也批評司馬遷：

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¹⁴

⁸ 西漢·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卷 17，頁 8035。

⁹ 清·錢大昕：《與梁燿北論史記書》，收入陳文和點校：《嘉定錢大昕全集·潛研堂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卷 34，頁 591。

¹⁰ 陳桐生反對《史記》為「謗書」之說，認為司馬遷從根本上擁護漢家政權，可參看。見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285-290。

¹¹ 《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91B.C.-49B.C.）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見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卷 62，頁 2737。「宣布」一詞，王國維釋之曰：「蓋上之於朝，又傳寫以公於世也。」見氏著：《太史公行年考》，《觀堂集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卷 11，頁 512。但若《太史公自序》所載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320）的「名山」，如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東晉·郭璞所釋，為「古帝王藏策之府」（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321），那麼朝廷本就藏有《太史公書》。無論如何解釋，經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太史公書》因而大為流傳，應該可以確認。昭帝始元 6 年（81B.C.）召開鹽鐵會議，宣帝時由桓寬論次的《鹽鐵論》，論辯雙方都多次引「司馬子」之言，王利器言認為，這些引言，即不出之桑弘羊等人之口，「亦必為寬所潤色，是宣帝時民間亦有其書。」見西漢·桓寬編，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毀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4，頁 237。可見《太史公書》至少到宣帝時，已大為流傳，並有很高的地位，而更早期亦可能已有人傳述。

¹² 此類評斷的討論詳見下節。

¹³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引，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321。

¹⁴ 見東漢·班固：《典引》，收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卷 26，頁 614。

王允（137-192）亦稱《史記》為「謗書」，謂：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¹⁵

王肅（195-256）對魏明帝曹睿（226-239 在位）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亦曰：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¹⁶

衛宏與王肅有關武帝削書之說的可信度，後人頗有疑之者¹⁷，但衛宏與王肅之說縱使不可靠，武帝覽景紀與武紀而大怒的說法，卻生動地反映《史記》的評價標準不與朝廷同流，甚至具有政治上的異端性的特色。這與批評《史記》「貶損當世」或「謗書」的說法，同樣看到了《史記》在政治立場上「貶天子」的異端性。事實上，由於司馬遷秉持「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對帝國政治方向與政策缺失的批判，甚至直指最高當權者，《史記》對漢代帝王以及漢代政治的書寫，頗多貶損之處。此點前人論述已多，本文不再討論。¹⁸

不管是「是非頗繆于聖人」之類的評斷，或是看到《史記》對漢室的非貶，都指向《史記》具有的異端性。前者是思想文化上的異端性，也是異於聖人的基本價值的取捨；後者則是政治上的異端性。

由上可知，縱然司馬遷自覺要繼承孔子作《春秋》，懷抱以《史記》作為第二部《春秋》，或「以史為經」的經學理想，並與當時大一統與尊君的政治主流思維呼應，

¹⁵ 見三國吳·謝承：《後漢書》，引自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第六》（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6，頁 180。裴松之雖懷疑其事可信度，認為係謝承妄記，但謝承的記載，卻也說明更具概括性的「謗書」一詞出現，距「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的批評，只有一步之遙了。

¹⁶ 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王肅傳》，卷 13，頁 418。

¹⁷ 例如清·梁玉繩即反對衛宏與王肅等人之說，謂：「余以為諸說皆妄也。」見梁玉繩：《史記志疑》，收入《百部叢書集成》86 輯（臺北：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1966），卷 7，頁 40-41。它如余嘉錫、范文瀾等人也有類似看法，茲不贅。

¹⁸ 可參看徐復觀：〈論史記〉，《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卷 3，頁 305-442；施丁：〈司馬遷寫當代史〉，收入張維嶽編：《司馬遷與史記新探》（臺北：崑崙書社，1985），頁 185-214。呂世浩：〈「貶損當世」——對漢代政治的挑戰〉，於《史記》對武帝的評價，有較全面的討論，見氏著：《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62-87。

具有極強的正統性。然而，在《史記》中卻也很容易找出具有異端傾向的論述，其中有些被視為異端性的論述或許是出於誤讀，有些論斷卻言之有據，因此對於《史記》何以表現出正統與異端兩面性，有必要找出其根由予以解釋。

三、「是非頗繆于聖人」的評斷——從揚雄到班固

《史記》價值立場上表現的複雜性，西漢揚雄¹⁹（53B.C.-A.D.18）論及太史公時，已經對太史公言是否合乎聖人難有前後一貫的判斷。《法言·君子》云：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²⁰

「聖人將有取焉」，其義雖不必如北宋宋咸所言拘泥，謂：「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²¹但揚雄認為太史公之說有合於聖人價值標準處，殆無可疑。

然而，揚雄在尊崇聖人的思想立場下，對太史公言仍不無愛恨交織之處，《法言·問神》云：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何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²²

此處雖承認太史公「多知」，甚至驚嘆太史公「多知」，卻惋惜太史公言義理不純，與聖人不同。這也就是《法言·君子》所說的：「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²³唯其「愛奇」，是以難免「雜」，有違孔子「愛義」之純然合乎道。《法言·寡見》又云：

¹⁹ 揚雄之姓是「揚」抑或「楊」，《漢書》各版本並未統一。段玉裁、王念孫、朱駿聲主張從「木」的「楊」，影響甚大，但徐復觀考證當為從「手」的「揚」後，研究者已逐漸接受其說法，茲從之。參見氏著：〈揚雄論究〉，《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卷2，頁445-449。

²⁰ 西漢·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十八·君子》（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12，頁507。

²¹ 西漢·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引，卷12，頁507。

²² 西漢·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八·問神》，卷5，頁163。

²³ 西漢·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十八·君子》，頁507。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其《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²⁴

「或問」所言，不論是揚雄自我設問，或代表當時流行的看法，皆顯示〈太史公自序〉所引遷父司馬談（？-110B.C.）〈論六家要旨〉之言，已被視為司馬遷的觀點。而「《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也是後來「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之評價的先聲。揚雄站在尊聖、尊經的立場，特指出《五經》並不繁瑣，古之學者在耕且養的條件下，仍只需三年即足以通一經，後學才趨於繁瑣，以此駁正「《五經》不如《老子》之約」的說法。揚雄此處所言，蘊含對〈論六家要旨〉評價《五經》與《老子》之立場不以為然，並直接認為司馬談父子在這方面立場的一致性。後來班固（32-92）在《漢書·揚雄傳》更直接歸納揚雄的立場，認為他批評太史公「是非頗繆於經」：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繆於經。²⁵

班固歸納揚雄對太史公的看法為：「不與聖人同，是非頗繆於經。」此論不能說沒有根據，但力道強了一點，他將揚雄認為「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的一面捨棄，也就把揚雄拉進自己的同一陣線。

班固認為《史記》呈現的價值標準頗繆于經書或聖人（孔子）的觀點，是影響後世最鉅的說法，班固承襲其父班彪（3-54）的論點²⁶，謂：

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²⁴ 西漢·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十·寡見》，卷7，頁222。

²⁵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卷87，頁3580。

²⁶ 班彪〈後傳略論〉評司馬遷書云：「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蔽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班彪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40上，頁1325。

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²⁷

班固「其是非頗繆于聖人」的評斷，已經蘊含《史記》與聖人價值系統的重大歧異。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批評《史記》帶有思想文化上的異端性，廣義而言，思想上的異端性包含《史記》與《六經》傳達的重大價值的衝突，「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只是舉重要之例言之。「論大道」、「序遊俠」、「述貨殖」雖然並列，其實位階並不相同。當然，班固用了「頗繆于聖人」的「頗」字，代表他並未認為《史記》的價值標準與聖人完全不同，只是在相當程度上異於聖人。

班固的論斷雖有疏失，後人亦多有駁之者²⁸，但「其是非頗繆于聖人」的論斷並非憑空立論，司馬遷的思想中確實具有合乎聖人與繆于聖人的兩面性。²⁹近人也有以「異端思想」或「叛逆思想」稱之者。³⁰而本文對「異端性」一詞的使用，包含思想文化上的異端與政治上的異端，前者指《史記》的評價標準頗異于聖人與五經，後者指司馬遷的評價標準不符絕對「尊漢」的要求。

對於《史記》表現出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原因相當多元，本文擬由司馬遷的家學、父命，以及繼承孔子作《春秋》這兩個重要角度，探討其根由。本文指出：對司馬遷修《史記》影響很大的家學、父命，以及繼承孔子作《春秋》的抱負，都各含有形成正統性與異端性混雜的因素，其中潛存的緊張性，對於司馬遷修《史記》表現的價值立場，有很大的影響。

²⁷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贊》，卷 62，頁 2737-2738。

²⁸ 有關班固批評司馬遷「其是非頗繆於聖人」的觀點，歷來為史公辯白者甚多，較早且較完整的討論可參見王叔岷：〈班固論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辯〉，《史記斟證》第 10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附錄二〉，頁 3517-3534。

²⁹ 筆者曾討論過此一問題，見〈史記思想與先秦儒、道、法家的關係〉，收入林聰舜：《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家的關係》（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 197-224。

³⁰ 前者如任繼愈：〈司馬遷的哲學思想〉，《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458-470。後者如祝瑞開：《兩漢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論及《史記》時，是以「司馬遷的叛逆思想、歷史哲學」作標題。

四、家學、父命中多元價值的拉扯——史公如何接受家學、父命並超越之，以消融黃老與儒學的衝突

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是一位知識廣博的學者，也是很有名的黃老學者，他曾經「習道論于黃子」³¹，所作的〈論六家要指〉最推崇道家，其餘五家各有短長，道家則兼具五家之長。而〈論六家要指〉所述道家的特色，與《老》、《莊》頗有出入，若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比較，思想特色則較為接近，那麼〈論六家要指〉所論的道家應即黃老思想。³²由司馬談的思想傾向，可知司馬遷的家學中，黃老思想佔有很重要的成分。

漢初的黃老政治，具有清靜無為與承襲秦制的兩面性，而此一道家傾向與法家傾向兩面俱存的特殊政治現象，都可以在《黃老帛書》中找到思想根據。而不管是「承襲秦制」或「清靜無為」，都反對變革，避免挑戰現存秩序，有很強的保守性格。司馬談曾從之「習道論」的黃老學者黃生，與轅固生於景帝面前關於「湯武受命」的爭辯，恰生動反映黃老此一特色：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³³

黃生反對儒者「湯武受命」的說法，他的論述，把黃老學派藉著名分的規定，企圖建立永不可變的君臣之別的立場，講得非常具體。景帝出面打圓場，是因轅固生擡出高帝代秦的「故事」，難以駁斥其說，但明顯不悅「受命放殺」之言，只好柔性勸

³¹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頁 2709。

³² 陳麗桂指出：作為黃老道家思想理論判準的文獻，馬王堆黃老帛書是第一把標準尺，〈論六家要旨〉是第二把。它具體而微地提挈了戰國以來黃老思想的核心課題。見氏著：〈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收入《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洪葉文化事業，2002），頁 387-410。另可參見拙作：〈論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收入林聰舜：《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家的關係》，頁 50-54。

³³ 西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 121，頁 3122-3123。

阻學者暢言「湯武受命」之說。黃老站在帝王立場，反對變革，避免挑戰現存秩序的頑強保守性格在此揭露無餘。

司馬遷傳承了司馬談的黃老家學，然而，司馬遷的時代儒學已經抬頭，司馬談不忘給他強化儒家的經典教育，「年十歲則誦古文」，並受學董仲舒、孔安國，有深入的儒家經典教育。特別是司馬談臨終時寄望司馬遷繼任太史令，並完成自己所欲論著而未完成的《太史公書》。司馬談心目中修史的意義在於：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³⁴

這裏有維持歷史論載傳統，接續歷史文化傳承的作史志業的期許。而且在漢朝重視「孝」的氛圍中，把「孝」的意義擴大。除了「續吾祖」、「無忘吾所欲論著」的家族傳承、歷史文化傳承外，更把周公在《詩》、《樂》方面的論著視為「孝之大者」，而周公「論歌文武之德」等成就，不也就是著史嗎？至於認為完成《太史公書》，等於繼承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的偉大事業，並以「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相期許，更明顯勉勵司馬遷繼承孔子作《春秋》³⁵，完成漢代的《春秋》——《太史公書》。

司馬談留給司馬遷黃老家學，又強化其儒家的經典教育，並在臨終前遺命遷繼

³⁴ 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295。

³⁵ 三國魏·張晏、東漢·服虔等人，俱根據〈太史公自序〉「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以武帝元狩元年（112B.C.）獲白麟，為《史記》述事年代下限，並認為《史記》有意模仿《春秋》獲麟絕筆。張晏說見裴駟：《史記集解》引，服虔說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參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301。清·梁玉繩雖採用「至太初而訖」之說，卻也認為「若所稱麟止者，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也。」見氏著：《史記志疑》，卷 36，頁 10。當然，《史記》由於經過幾度修補，述事年代下限史公自己即有不同說法，詳見張大可：〈史記名稱與斷限〉，《史記文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第三章，頁 98-129；逢耀東：〈「巫蠱之惑」與司馬遷絕筆〉，《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頁 389-431。

任太史令，完成繼承儒家傳統的《太史公書》。但司馬談仍不脫黃老學者的立場，特別是他對作史目標的要求仍明顯表現出政治上的保守性格：「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這是偏重於記載、頌揚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保守性格的作史目標。由此可知，司馬遷承自其父的家庭教育與臨終的作史遺命，都含有黃老與儒家理念夾雜的多元價值，甚至會形成儒家與黃老間緊張性的拉扯。

由於司馬遷的黃老家學背景，班固批評的「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史記》中出現的看重黃老的記述，很容易被解釋為家學淵源的關係。³⁶然而，由家學淵源詮釋黃老與儒學理念的衝突只是最表層的，需要進一步的梳理。如上文所言，司馬談的黃老思想或臨終遺命的作史目標，均有濃厚的保守性格，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黃老以評斷史事，或繼承孔子作《春秋》的抱負，卻有明顯的批判性。有關司馬遷超出其父勉勵，對繼承孔子作《春秋》的意義的進一步體認，詳見下節論述，茲先探討《史記》借用黃老評斷史事的特色。

《史記》對黃老無為的肯定，有些屬於事實陳述，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異端性評價關係不大，例如稱讚曹參：「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³⁷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³⁸稱讚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³⁹這些看法大抵是漢代人的公論，談不上特別看重黃老而貶低儒學。

值得注意的是，《史記》中有不少地方藉道家言或黃老³⁹批評儒家或當朝政治，諸如：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³⁶ 持此論者甚多，例如張大同：〈司馬遷與道家思想的關係〉，山東大學《文史哲》5（1992），頁 29-34；曹東方、徐淑梅：〈試論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吉林師範學院學報》20：2（1999.3），頁 39-43。

³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曹相國世家》，卷 54，頁 2029、2031。

³⁸ 西漢·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贊》，卷 9，頁 412。

³⁹ 《史記》中，老子、黃老、道家等語常可相通。

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⁴⁰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代表道家學派對儒者形象的看法，《史記》收錄這段批評，可視為司馬遷同意儒者有此一缺點，尤其是逐漸進入體制，掌握權力的漢儒。

《史記》也經常引道家言批評漢的嚴刑酷法政策，〈酷吏列傳〉云：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為圓，斫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⁴¹

「不德」就是無為，「不失德」就是有為，這是以老氏的無為、不作偽批評武帝一朝奸偽萌起的酷吏政治。並且以漢初黃老政治「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批評武帝酷吏政治的適得其反。這也就是〈循吏列傳〉所感慨的：「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⁴²

經濟活動上，司馬遷也主張因任的政策，在道家因循、自然觀念中找理論根據，反對武帝過度干預、與民爭利的財經政策。他說：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⁴³

不管是肯定漢初的黃老政治，或者藉道家言（黃老）批評儒家與當朝政治，表現了司馬遷肯定道家或黃老的一面，但此一肯定並未達到他尊崇孔子，以作《春秋》傳達王道理想作為政治的終極理想的高度，而只是肯定黃老政治在歷史中的階段性功能，甚至是將保守性格的黃老思想拿來當作批判武器，這是要分辨清楚的。

依照班固的評價標準，看重黃老就是「是非頗繆于聖人」，而不管是從司馬遷的家學或其父臨終遺命觀之，都已涵有會形成儒家與黃老理念間緊張性拉扯的因素。

⁴⁰ 西漢·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 63，頁 2140。

⁴¹ 西漢·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卷 122，頁 3131。

⁴² 西漢·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序》，卷 119，頁 3099。

⁴³ 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卷 129，頁 3253。

然而，《史記》表面上雖呈現「是非頗繆于聖人」的異端性，也很容易被解釋為家學淵源的關係，但司馬遷其實已消融了儒家與黃老理念間表面上的對立。例如司馬談的黃老思想具有濃厚的保守性格，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黃老以評斷史事，卻有明顯的批判性。黃老思想中反對變革、避免挑戰現存秩序的頑強保守性格，在《史記》中明顯被轉化了。同樣地，司馬談勉勵司馬遷繼承孔子作《春秋》，對作史目標的要求表現的保守性格，在《史記》中也被轉化了。

《史記》中經常藉道家言（黃老）批評儒家與當代政治，道家言（黃老）成為批判時政與儒者缺陷的理論根據之一，但黃老絕不是司馬遷追求的終極理想，藉道家言而來的批判，其目的仍是追求他心目中的《春秋》王道理想的實現。所以《史記》雖受到黃老影響，有時並藉以批評儒學，但我們解釋時得多一些轉折：正是司馬遷繼承孔子作《春秋》，追求王道理想而來的批判性，轉化了司馬遷家學中黃老思想的保守性格，也轉化了司馬談臨終作史遺命中所呈現的保守性格。黃老思想與黃老政治在《史記》中常被用來當作批判的武器，雖造成黃老與儒學的緊張性，以及「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觀感，但衝突其實在司馬遷作史追求《春秋》王道理想中被消融了，藉黃老而來的批判性，在《史記》中成為達成追求王道理想的實現的一環，黃老的異端性在更高層次中被消化了。

從此一詮釋的角度看，「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批評，雖不難找到自圓其說的證據，但就《史記》終極的價值追求而言，是不能成立的。弔詭的是：《史記》被視為「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原因，往往是由於藉黃老批評儒家或批評當朝政治，而這些批判性卻與漢初黃老思想與黃老政治表現的保守性格大不相同。司馬遷巧妙地轉化保守性格的黃老，作為批判的武器，成為達成追求王道理想的實現的一環。此一轉化，歷來批評《史記》「先黃老而後六經」的人都沒有注意到。

五、承續《春秋》而來的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及對立的消融

司馬遷繼承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記》，有來自其父的臨終期許，但以《史記》體現《春秋》的經學理想與王道理想的修史志業，乃是承自董仲舒，並在自己作史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特殊體認。換言之，司馬遷對孔子作《春秋》的意義的體認，遠超過其父司馬談作史遺命中對孔子作《春秋》的意義的體認。因此，本節將針對司馬遷對《春秋》發展出特殊體認，使《史記》表現出正統與異端兩面性的問題另作討論。

繼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志業，是司馬遷作《史記》很重要的價值追尋，而《史記》表現出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很大的原因也來自其對孔子作《春秋》的理解與追摹。當然，司馬遷心目中《春秋》的理想，主要指《公羊》學義理而言。

在〈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儒林列傳〉等處，司馬遷一再強調孔子作《春秋》的重大意義，〈太史公自序〉與壺遂的一段對話，表明孔子作《春秋》的動機，更是司馬遷的夫子自道：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⁴⁴

這段對話集中說明了《春秋》所標示的王道的重要內容，更說明了《史記》的抱負：繼承孔子作《春秋》，藉歷史褒貶樹立王道理想（或經學理想），以垂教後世。司馬

⁴⁴ 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頁3297。

遷表達繼承孔子作《春秋》的心志之後，在對話的後半段，似乎被壺遂說服，否認先前作《史記》是效法孔子作《春秋》之說，甚至不再堅持《春秋》的刺譏作用。但這應解釋為應付正統派學者挑戰，或經好友好心提醒後的障眼法，是面臨現實壓力下，先用「微言」委婉表達自己見解，再用「反語」作掩護的特殊表達方式。⁴⁵

《史記》效法孔子作《春秋》，展現「以史為經」的經學企圖，在武帝時期儒學逐漸趨於一尊的環境中，表現與主流思想合拍的關注；就儒術獨尊之後的後人的批評標準而言，也呈現極強的正統性。我們甚至可以把《史記》放到西漢思想家以經學義理為漢帝國建立理想秩序的脈絡中，視為當時主流學術思想的一環。

司馬遷心目中的《春秋》乃是西漢流行的《公羊》義理，〈自序〉中回答壺遂「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之問，即是引《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之言作答，而其內容頗多出自《春秋繁露》。⁴⁶《史記》他處論及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⁴⁷「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⁴⁸等觀念，也出自《公羊》學大師董仲舒。⁴⁹可見司馬遷對《春秋》的看法，受到《公羊》義理很大的影響。⁵⁰

《公羊春秋》是司馬遷時代盛極一時的主流思想，除了董仲舒此時正透過《公羊》義理，企圖建立以儒學為主導的新統治秩序外，公孫弘以《公羊春秋》由白衣

⁴⁵ 吉川幸次郎指出：「司馬遷雖然自己謙稱無法比擬孔子，《史記》也無法與《春秋》抗衡，但在謙讓之餘，仍然難掩他那一股咄咄逼人的自負。」見〔日〕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向常識的反抗——司馬遷史記的立場〉，《中國詩史》（臺北：明文書局，1983），頁97。吉川幸次郎認為：司馬遷否認作《史記》是效法孔子作《春秋》，係出於謙讓。此論雖有爭議，但「仍然難掩他那一股咄咄逼人的自負」，卻生動地傳達了司馬遷企圖效法《春秋》的抱負。

⁴⁶ 吳汝煜列舉三條理由，認為司馬遷曾師承董仲舒；另外，將《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答壺遂之語，與《春秋繁露》中的〈楚莊王〉、〈玉杯〉、〈王道〉、〈盟會要〉、〈俞序〉、〈重政〉、〈滅國上〉等篇章中的言論逐一對照，認為這正是司馬遷曾從董仲舒受學的印記。見氏著：〈史記與公羊學——史記散論之五〉，《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82），頁1-8。司馬遷曾師承董仲舒之說，學界雖尚有不同意見，但司馬遷在〈自序〉中回答壺遂「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之問，即是引《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之言作答，則是非常明確的事實。

⁴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序》，卷121，頁3115。

⁴⁸ 西漢·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卷14，頁509。

⁴⁹ 張大可：《司馬遷評傳》，收入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1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頁58-62。

⁵⁰ 阮芝生認為：《史記》之於三傳，實為「義主《公羊》，事採《左氏》」，故《史記》所言與所欲繼之《春秋》應為《公羊春秋》，可參看。見氏著：〈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臺大歷史學報》23（1999.6），頁1-59。

封侯拜相，著名的《春秋》決獄亦是以《公羊》之義正之，而武帝更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⁵¹可見《史記》對《春秋》義理的繼承，也有回應時代主流思潮的一面。

在司馬遷時代的政治環境中，《公羊》義理有很多帝國需要的觀念，諸如推崇天下統一於天子的「大一統」說：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⁵²

這是「大一統」一詞的最早出處。後來公羊學大師董仲舒更大力闡揚「大一統」觀念，在第三次〈舉賢良對策〉時，特別提出「大一統」的觀念，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⁵³追求以儒學為主導的一統的新統治秩序的實現。⁵⁴

《公羊》義理又有「尊王」說，《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傳》云：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⁵⁵

這是站在「尊王」的立場，褒獎蔡人、衛人、陳人服從王命，從王伐鄭。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子狩于河陽。」《公羊傳》云：

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⁵⁶

晉文公兩度召周天子，《公羊傳》站在「尊王」的立場，先是云：「不與致天子也」⁵⁷，

⁵¹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儒林傳》，卷 58，頁 3617。

⁵² 《公羊傳》訓解《春秋·隱公元年》經文「元年，春，王正月」提出的觀念，見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卷 1，頁 6-11。

⁵³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卷 56，頁 2523。

⁵⁴ 參見拙作：〈帝國意識形態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學〉，《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39-179。

⁵⁵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桓公五年》，卷 4，頁 97-98。

⁵⁶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僖公二十八年》，卷 12，頁 304。

⁵⁷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僖公二十八年》，卷 12，頁

再云：「不與再致天子也」，兩度言之，深不以為然。所以訓解《春秋》書例所不書的常事「狩」，具有譏貶晉文公「再致天子」的特殊用意。董仲舒同樣站在「尊王」的立場，對晉文再致天子之事有所論斷：

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⁵⁸

「內心予之」是理解現實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是空談，肯定晉文霸業的貢獻。然專征專討、以臣召君，混亂上下秩序，畢竟非諸侯所當為，故站在「尊王」的立場，在書法史筆上，「絕而不予」。在闡發「尊王」，以強化皇權的立場上，《春秋繁露》更適應帝國需要，發展出極端尊君的論述⁵⁹，並且在中央集權的要求下，強力反對諸侯國擅自征伐，脫離《春秋》的評價，徹底貶低五霸：「五霸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闕猶珉珉比於美玉也。」⁶⁰這些主張直接反映了漢朝廷的基本利益與迫切需求。

此外，武帝時期黃老思想因不符時代需求，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武帝意圖大規模建構制度，建立勳業。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冊問，可以看出他確實意識到建立統貫上層建築的思想體系的迫切需要，「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⁶¹即是想知道統貫一切事物的思想體系的核心；「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⁶²關心的則是政權的正當性、君權的神聖性、天人感應的世界觀、人性與教化等根源性的問題。在這方面，董仲舒推展《公羊傳》中「三世異辭」的說法，提出「張三世」、「通三統」的理論，作為漢

302。

⁵⁸ 西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王道》（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4，頁117。

⁵⁹ 參見拙作：〈帝國意識形態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學〉，《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頁139-179。

⁶⁰ 西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卷9，頁268-269。

⁶¹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頁2495。

⁶²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頁2496。

王朝「改制」的依據⁶³，呼應了武帝時期的帝國需要。《史記》在循環論的框架下強調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觀，也是在傳承《公羊》義理下，呼應帝國「改制」的歷史要求。諸如：

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⁶⁴

夫常星之變希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⁶⁵

由上可知，《史記》效法孔子作《春秋》，展現「以史為經」的經學企圖，有極強的正統性；把《史記》繼承《春秋》的「以史為經」的抱負，放到西漢思想家以經學義理為漢帝國建立理想秩序的脈絡中，視為當時主流學術思想的一環，也可以看出其正統性；而《公羊》義理中符合帝國需要的主張，諸如「大一統」、「尊王」、「通三統」等，《史記》在肯定秦漢以來的大一統與尊君的中央集權制，呼應帝國「改制」的歷史要求下，都在他「通古今之變」的歷史思維下，多有繼承發揮。《史記》呼應時代與朝廷要求的正統性，正有其承繼自《春秋》的理念的影響。

然而，史公引董仲舒，謂孔子作《春秋》的用心是：「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已經帶有很明顯的異端性，是對當權派的價值標準嚴肅的挑戰。而且司馬遷深知挑戰當權派價值標準以寄寓王道理想，要面臨巨大壓力，此一理念與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無法直捷表達，所以對《春秋》的「微言大義」多所闡發。⁶⁶司馬遷不但對《春秋》的「微言大義」深有體會，在《史記》中也運用得更為出色，漢明帝即留意到此一敘事方式，批評他：「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史記》或者透過直捷了當的敘事，或者透過「微言」的表現手法，從體制、

⁶³ 除了〈舉賢良對策〉外，《春秋繁露義證·三代改制質文》有集中的論述。另參看陳其泰：〈春秋公羊義〉，收入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卷，頁562-566。

⁶⁴ 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贊》，卷8，頁393。

⁶⁵ 西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贊》，卷27，頁1351。

⁶⁶ 司馬遷對《春秋》的看法，誠然受到《公羊》義理很大的影響，所謂：「義主《公羊》」，但《史記》筆法的淵源，卻不受限於《公羊》，此當分辨。《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的關係，可參看張高評：〈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57-103。

編次的安排，到佈局謀篇，再到行文時諸如對比、暗示等技巧的運用，在在都可看到史公以隱微之言傳達言外之旨，以達「具見其表裏」⁶⁷的目的之用心。史公以此呈現歷史的真實，寄寓作史的理想。由是，《史記》敘事遂被視為「書法不隱」的「實錄」。後人也留意到史公對漢朝廷的批評，如上文提及衛宏與王肅有關武帝削書之說外，劉知幾曾如此感歎：

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于吳朝，崔浩犯諱于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足以驗世徒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⁶⁸

《史記》在書寫漢朝的歷史時，對漢代政治頗多銳利的批評。這些敘事的評價標準不符「尊漢」的要求，呈現了《史記》在政治上的異端性。關於《史記》何以呈現此一異端性？有人從司馬遷具有作史的良心解釋⁶⁹，有人由中國具有「書法不隱」的優良史官傳統解釋⁷⁰，甚至有人認為是司馬遷遭受宮刑後的怨懟。⁷¹這些解釋都有其立論的基礎，但本文補充一個重要的因素：《史記》表現出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很大的原因也來自其對孔子作《春秋》的精神的追摹。

⁶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卷 28，頁 1404。

⁶⁸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直書第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7，頁 193。

⁶⁹ 徐復觀認為：《史記》大義的第一特點，乃是「在政治的成王敗寇、賞榮誅辱的巨大勢利浪潮中，以巧妙的手法，透出歷史的真實，展現歷史的良心。」並認為〈封禪〉、〈平準〉兩書對武帝私生活與政策「具見其表裡」的揭露，是後人無法企及的鉅製，而此成就乃來自「其良心所賦予於他的卓識與勇氣」。見氏著：〈論史記〉，《兩漢思想史》，卷 3，頁 409、371-381。

⁷⁰ 《左傳》中有很多史官「書法不隱」的記載，表現先秦史官的優良傳統，孔子即稱讚：「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見周·左丘明傳：《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卷 21，《左傳·宣公二年》，頁 688。後來劉向、揚雄稱許《史記》為「實錄」，劉知幾感歎「實錄之難遇」，都是對此一傳統的肯定。有關《史記》對《春秋》「書法不隱」筆法的繼承，可參看汪涓：〈「直筆」探微：中國古代史學求真觀念的發展與特徵〉，《史學理論研究》3（1999），頁 10-19；張金梅：〈從左傳到史記：春秋筆法的早期發展及其基本內涵〉，《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3（2012.5），頁 45-49。

⁷¹ 此一說法甚早出現，衛宏、東漢明帝劉莊、王允、魏明帝曹睿等人的說法屬之。但韓兆琦反過來認為：司馬遷受宮刑的原因，不是因為替李陵辯護，「沮貳師」、「誣上」，而是因為寫《史記》，批判漢帝國黑暗面的宿怨，李陵事件只是被武帝抓住的一個藉口。韓兆琦的說法，認為司馬遷寫《史記》，批判漢帝國黑暗面於前；受宮刑後，更堅定他作史理想的追求。參見韓兆琦：〈司馬遷受宮刑〉，《史學史資料》4（1979），頁 29-32。

《春秋》（特別是司馬遷所理解的《公羊春秋》）本就有很強的批判性，尤其是政治批判。由於《公羊傳》常以「何以書」、「何以不書」、「何譏爾」等方式提問，去追尋《春秋》文本背後的義理，《公羊傳》就可以順利發展對《春秋》「微言大義」的發明⁷²，特別可以強調《春秋》所蘊含的隱諱的政治批判，所謂：「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⁷³這是說時代愈近，孔子就更因畏禍而謹慎，因而透過「微辭」的批判，使當事者讀其記載，仍不知是對自己的批判。至於「微辭」背後的譏刺，當然有待弟子後學，特別是《公羊》學者的闡發了。

至於孔子為何具有批判政治權威的權力，甚至可以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公羊傳》終卷訓解《春秋》經文「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云：

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⁷⁴

《公羊傳》認為，以「狩」字書寫薪采者獲麟，是將麒麟出現與王者有無聯繫起來，後來《公羊》學者更發展成孔子素王說。⁷⁵縱使不採用孔子素王說，麒麟被獲表示道之不行，故孔子曰：「吾道窮矣！」但西狩獲麟仍具重大意義，在「有王者則至」的認知下，麒麟出現仍代表王者出現的瑞應，孔子應順應天命，「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亦即傳堯、舜之道，安排撥亂反正的天下秩序，以待後之聖王。

由是，此處的「王者」出現與否，至少可以有三種涵義：一是麒麟出現，「應該」有王者出現；二是麒麟出現，現實上又無王者，此瑞應就應在孔子為素王；三是麒麟出現，王者終究也會出現，所以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此一立基於「西

⁷² 「微言」、「大義」兩個詞由西漢末的劉歆首先提出，見〈移書讓太常博士〉，引自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楚元王傳》，卷36，頁1968。其云：「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但對《春秋》經文「微言大義」的闡發，早在先秦就出現了。

⁷³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定公元年》，卷25，頁626-627。

⁷⁴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哀公十四年》，卷28，頁709-721。

⁷⁵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67。

狩獲麟」與「王者」出現的聯繫，給予《公羊傳》高達天命的批判根據，可以發展「撥亂世，反諸正」的批判精神，因而成為《公羊》學具有強烈批判性，尤其是政治批判的重要根源。《公羊傳》中言「褒」的只有一處，言「譏」（較輕微）、「貶」（較嚴重）、「絕」（最嚴重）的地方近百處⁷⁶，此一對現實的諸多批判，正有來自經典義理中高達天命的批判根據。

《公羊傳》的批判精神，經過董仲舒的闡揚，司馬遷深有體會，並在《史記》中一再強調，例如上文所引的「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這是由追求王道政治而來的批判精神的總綱。另外，司馬遷一再強調《春秋》藉褒貶以繩當世的批判性之意義。〈十二諸侯年表·序〉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⁷⁷

〈孔子世家〉云：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⁷⁸

〈匈奴列傳·贊〉云：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

⁷⁶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頁 102-111。

⁷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卷 14，頁 509。

⁷⁸ 西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卷 47，頁 1943。

哉！⁷⁹

正是取法《公羊》學的批判精神，加上對「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的堅持，《史記》發展出正史中最銳利的現實批判，特別是直指「今上」的政治批判，呈現了《史記》在政治立場上的異端性。⁸⁰

司馬遷自覺要繼承孔子作《春秋》，表現了他對經學理想，特別是《公羊》義理的追求。作《史記》也因而得以融入當時主流學術思想以經學義理為漢帝國建立理想秩序的脈絡中，並呼應尊君與大一統等帝國的歷史要求，這些都表現了《史記》的正統性。但繼承孔子作《春秋》，同樣也是追摹《春秋》藉褒貶以繩當世，挑戰當權派價值標準以寄寓王道理想。《史記》對漢代政治頗多銳利的批評，不符「尊漢」的要求，呈現了《史記》在政治上的異端性。此一批判精神也可以在《春秋》公羊學中找到根源，司馬遷對此也有相當自覺的體認。由上可知，《史記》表現出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可以由對孔子作《春秋》的精神的追摹得到部分的解釋。

然而，《史記》表現的正統性與異端性的對立，並不是絕對的對立，所以此一對立就有消融的可能，不至於造成《史記》論述立場或價值系統的矛盾。可以如是說：繼承孔子作《春秋》，藉歷史褒貶樹立王道理想（或經學理想），為漢帝國建立理想秩序，並垂教後世，這是司馬遷的根本理念與核心價值，是他作《史記》的目的。《史記》表現出的合乎正統性的書寫，可直接視為其中的一環。至於《史記》表現出銳利的現實批判，呈現政治立場上的異端性，應該視為《史記》繼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追尋王道理想的手段。亦即「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目的在於：「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目的在於：「以達王事而已矣」。由是，《史記》政治立場上呈現的異端性，位階次於正統性，在《史記》繼承孔子作《春秋》，追尋王道理想的書寫過程中，扮演工具性的角色。批判正是為了王道理想的呈現，不是為批判而批判，更不是存心毀謗的「謗書」。如是，《史記》政治立場上呈現的

⁷⁹ 西漢·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贊》，卷110，頁2919。

⁸⁰ 參見拙作：〈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一〉，《清華中文學報》5（2011.6），頁89-122。

異端性，也消融在更高的價值之中了。⁸¹

六、結語

傳統學者對於司馬遷思想合乎聖人或繆於聖人頗有爭議，擴而言之，就是對《史記》具有正統性亦或異端性的爭議。後人不同的理解與爭議，顯示《史記》具有的兩面性。對於此一現象，本文由形成司馬遷修史志業中很重要的家學、父命，以及繼承孔子作《春秋》這兩個重要因素，探討其根由。並進一步說明《史記》如何站在更高的作史理想，消融其間的對立，希望能補充學界對此一問題的詮釋。

司馬遷承自其父的家庭教育與臨終的作史遺命，都含有儒家與黃老理念為主的多元價值，甚至會形成儒家與黃老間緊張性的拉扯。《史記》中呈現「先黃老而後六經」之「頗繆于聖人」的異端性，也很容易被解釋為家學淵源的關係。但司馬遷接受家學、父命並超越之，轉化了家學中黃老思想反對變革、避免挑戰現存秩序的保守性格，也轉化了司馬談臨終作史遺命中所呈現的保守性格。因此，黃老成為批判時政與儒者缺陷的理論根據之一，作史更是具有追求王道理想而來的批判性。如此，肯定黃老也可以成為《史記》追求王道理想的一環，儒道衝突與黃老的異端性在更高層次中被消融了。

《史記》表現出正統與異端的兩面性，另一重要原因來自司馬遷對孔子作《春秋》的精神的追摹。《史記》效法孔子作《春秋》，在武帝時期儒學逐漸趨於一尊的環境中，呈現極強的正統性；就儒術獨尊以降後人的批評標準而言，也呈現極強的正統性。而《公羊》義理中符合帝國需要的主張，《史記》在肯定秦漢以來的大一統

⁸¹ 這樣的關係，形式上類似《公羊》學者對「經」與「權」的解釋，例如《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參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桓公十一年》，卷 5，頁 115。董仲舒曰：「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參西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玉英》，卷 3，頁 79-80。這些詮釋都不是把貌似對立的「經」與「權」放在同一位階，而是以「經」為根本、為原則，「權」的施行，仍是為了達成「經」的原則。

與尊君的中央集權制，呼應帝國「改制」的歷史要求下，多有繼承發揮。《史記》呼應時代與朝廷要求的正統性，正有其承繼自《春秋》的理念的影響。然而，繼承孔子作《春秋》，同樣也是追摹《春秋》藉褒貶以繩當世，挑戰當權派價值標準以寄寓王道理想。司馬遷所理解的《公羊春秋》本就有很強的批判性，尤其是政治批判，《史記》對漢代政治頗多銳利的批評，呈現了政治立場上的異端性，此一批判精神也可以在《春秋》《公羊》學中找到根源。

然而，《史記》政治立場上呈現的異端性，在《史記》繼承孔子作《春秋》，追尋王道理想的書寫過程中，是扮演工具性的角色。批判正是為了王道理想的呈現，如是，《史記》政治立場上呈現的異端性，也消融在更高的價值之中了。

《史記》雖表現出思想文化上的異端性與政治上的異端性，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但由於追求王道理想的自我期許，使《史記》的異端性與批判性並未流於偏激、謾罵，漢晉之間逐漸出現的《史記》是「謗書」的看法，自然難以成立。當司馬遷步入暮年，《史記》已基本完稿，在〈報任安書〉中回顧一生修史志業的意義，「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自負性宣告，正可印證《史記》表現出的異端性，已消融在更高的價值之中了。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 *西漢·公羊壽傳，東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 *西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 *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5。
西漢·桓寬編，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西漢·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西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引自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楚元王傳》，頁 1968-1971。
東漢·班彪：〈後傳略論〉，引自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班彪列傳》，頁 1325-1371。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
東漢·班固：〈典引〉，收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頁 614-615。
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0。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收入《百部叢書集成》86輯，臺北：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1966。
清·錢大昕：〈與梁耀北論史記書〉，收入氏著：《潛研堂文集》，收入陳文和點校：《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591-592。

二、近人論著

- 王叔岷：〈班固論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辯〉，《史記斟證》第 10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附錄二〉，頁 3517-3534。
-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觀堂集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頁 481-514。
- 任繼愈：〈司馬遷的哲學思想〉，《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458-470。
- * 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臺大歷史學報》23（1999.6），頁 1-59。
- 吳汝煜：〈史記與公羊學——史記散論之五〉，《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82），頁 1-8。
- 汪湄：〈「直筆」探微：中國古代史學求真觀念的發展與特徵〉，《史學理論研究》3（1999），頁 10-19。
- * 呂世浩：〈「貶損當世」——對漢代政治的挑戰〉，《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62-87。
- 林聰舜：〈論史記的以史為經〉，收入氏著：《史記的世界：人性與理念的競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 12-45。
- 林聰舜：〈史記思想與先秦儒、道、法家的關係〉，《西漢前期思想與法家的關係》，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 197-224。
- * 林聰舜：〈帝國意識形態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學〉，《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39-179。
- 林聰舜：〈史記的「微言」敘事：「書法不隱」與「隱」的統一〉，《清華中文學報》5（2011.6），頁 89-122。
- 祝瑞開：〈司馬談的唯物主義思想和司馬遷的叛逆思想、歷史哲學〉，《兩漢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134-154。
- 施丁：〈司馬遷寫當代史〉，收入張維嶽編：《司馬遷與史記新探》，臺北：崧高書社，1985，頁 185-214。
- * 徐復觀：〈揚雄論究〉，《兩漢思想史》卷 2，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 445-449。
- * 徐復觀：〈論史記〉，《兩漢思想史》卷 3，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 439-562。

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陳麗桂：〈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收入《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洪葉文化事業，2002，頁 387-410。

陳其泰：〈春秋公羊義〉，收入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 1 卷，頁 548-578。

張大同：〈司馬遷與道家思想的關係〉，山東大學《文史哲》5（1992），頁 29-34。

*張高評：〈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 57-103。

張大可：〈史記名稱與斷限〉，《史記文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頁 98-129。

張大可：《司馬遷評傳》，收入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 1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張金梅：〈從左傳到史記：春秋筆法的早期發展及其基本內涵〉，《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3（2012.5），頁 45-49。

曹東方、徐淑梅：〈試論司馬遷與儒道思想的關係〉，《吉林師範學院學報》20：2（1999.3），頁 39-43。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遼耀東：〈「巫蠱之惑」與司馬遷絕筆〉，《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頁 389-431。

韓兆琦：〈司馬遷受宮刑〉，《史學史資料》4（1979），頁 29-32。

〔日〕吉川幸次郎著，劉向仁譯：〈向常識的反抗——司馬遷史記的立場〉，《中國詩史》，臺北：明文書局，1983，頁 97-102。

*〔美〕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活著為了著書，著書為了活著——司馬遷的工程〉，收入氏著：《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79-84。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ao-Ping. *Chunqiu Shufa yu Zuozhuan Xueshi* (The Penmanship of Chunqiu and the History of Zuo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 Studies). Taipei: Wu-Nan Book Inc., 2002.
- [Han] Ban Gu. *Han Shu* (History of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Lin Tsung-Shun. *Handai Ruxue Biecai-Diguo Yishixingtai de Xingcheng yu Fazhan* (New Perspectives on Confucian Learning in the Ha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Ideolog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Lu Shih-Hao. *Cong Shiji dao Hanshu-Zhuanzhe Guocheng yu Lishi Yiyi*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o History of Han Dynasty: The Transition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Tang] Kong Ying-Da, annotator.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The Standard of Chunqiu Zuozhuan). Taipei: Taiwan Ancient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Owen, Stephen. *Tashan de Shitouji-Yuwen Suoan Zixuanji* (Borrowed Stone: Stephen Owen's Selected Essay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06.
- Ruaan Jy-Sheng. "Lun Shiji Zhong de Kongzi yu Chunqiu" (On Confucius and Chunqiu in Shiji), *Historical Inquiry* 23(1999.6): 1-59.
- [Han] Ssu-ma Ch'ien. *Shih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aipei: Ting Wen Book Company, 1985.
- [Qing] Su Yu, annotator. *Chunqiu Fanlu Yizheng* (Chunqiu Fanlou Explan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Xu Fu-Guan. *Lianghan Sixiangshi*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n Dynasty: Volume two).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2000.
- Xu Fu-Guan. *Lianghan Sixiangshi*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n Dynasty: Volume three).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2002.
- [Tang] Xu Yian, annotator. *Chunqiu Gongyangzhuan Zhushu* (Chunqiu Gongyangzhuan Explanation). Taipei: Taiwan Ancient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